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	金大陆
【史海钩沉】	府学胡同故事：神秘的大院	黄秀纯
【不堪回首】	天啊，见到父亲那牛鬼蛇神的样子！	赵旭
【各抒己见】	谈谈“文革”	严锋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

·金大陆·

一、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1966年8月中、下旬，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上海，下车伊始，深感北京文革与上海文革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悬殊差异，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掀动起了冲击上海市委的“8·31”事件和“9·4”事件，结果遭至上海方面的强烈抵制（因关涉运动，容后研究）。霎时，上海的形势扑朔迷离，作为北京红卫兵方面，既不甘雌伏以待，便紧急派出代表回京控告；又感叹“现在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9月6日，部份北京红卫兵还在同济大学召开其它省市在沪学生交流会，“了解各地省市的情况，准备去搞”。正是在这种瞻前顾后、彷徨失措的时候，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队伍悄悄地集合了（北京红卫兵共有三次南下）。

如果说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是以自由、分散的形式结构队伍的；那么，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甚至负有调查“8·31”、“9·4”事件，企图在上海市民中重新塑造北京红卫兵形象的使命。9月9日下午，周恩来会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该兵团的准备情况（此前集训3天）。第二天，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即席发表了讲话。周在告诫第二次南下上海的红卫兵要“开展社会调查”，“不要变成一个工作组，去包办代替人家那个地方的工作”，不要“和北京先去的同学、红卫兵对立”，并叮嘱“上海是最大的进出口海港、码头，有很多外国人”，总不能“去问你是不是红五类”；“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做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不是看到什么不顺眼就把它搞掉”之后，就上海的文革运动态势讲了两点至关重要的意见，那就是：

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

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显然，此中除了在1966年的形势下，必需述说的一套语言外，周恩来关键的态度是力挺了上海“那个地方的领导”，而将矛头引向了上海“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其实，此中的逻辑，此中的分野——一方重点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强调打击“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鲜明而实在的，乃至在整个文革运动时期，两个方面时而侧重，时而并重，都是始终贯穿着，进行着的。事实上，这既是对首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告知，又是对即将出发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提醒。

与此同时——9月9日下午，正为“8·31”、“9·4”事件而处于茫然之中的在沪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各校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成立“北京红卫兵联络总站”，推选了清华大学吴某某为首的三位负责人，并制定了“辟谣”、“到工农中去串联”等经改变了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诚然，这种事件结束之后才成立所谓联络机构的举措，不啻是个滑稽，起码说明事件发生时，其人员的鸠集，其行动的进退，完全凭仗现场群体意志的趋动，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所以，当下的这片声张，除了证明首次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份人准备“坚持”以外，哪能抵挡得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轰隆隆的步伐和威势呢！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大学红卫兵为主，有一百左右的中学红卫兵随队参加。兵团共分十六个纵队，总人数超过两千。在此值得注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同时派往新疆的“没有超过四百人”；赴中南郑州、武汉、长沙一线的“三百五六十人”；西进西安、兰州的“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北上东北的为“三百人”，即总和人数只有上海的一半。由此可见，在北京红卫兵的视野中，上海的地位无出其右，是独特而又重要的，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9月11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同时，上海市委还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的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言》多是以最圆满的姿态、最高昂的音调昭示天下，多是响亮而恢宏的。然而，当降临到地上，回复到现实，宣言的姿态和音调又会是怎样的呢？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声明“是来上海学习的”，但在现实的提问中，却尖锐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况，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虽然只是以交流经验的座谈会拉开序幕，但北京红卫兵在身份认知和现场气势上，始终占据制高点，始终强势出击，始终在一系列的追问中，显露着、展示着、张

扬着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直至公开就“打人”的问题表达了“应允”的意见，确实为他们日后的行动制作了另一篇“宣言”。14日，部份南下兵团成员乘坐有关部门安排的客车，浩浩荡荡地开赴闵行重型机器厂，参观了证实上海工业成就的万吨水压机。

应该承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尤其当这几种优势聚焦一体的时候，不论对从五湖四海汇流来的各地串联学生来说，还是对经历了“8·31”、“9·4”事件后的那批北京红卫兵而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的地位，就如同其总部的地理位置一样，不仅因处于中心而惹眼、而显赫；更因处于要冲而威风、而紧要。正是缘于这样的境况，“9·4”事件后设立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草草地宣布解散，包括其负责人清华吴某某等绝大多数“冲进过市委”的北京红卫兵陆续返京，只留下一负责人参与南下兵团的活动。原联络站的一辆宣传车，也正式移交给了南下兵团。

因之，1966年9月10日以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格局存在三种情况：

首先，是第二次集体南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除了南下兵团总部设在市中心的市体育宫外，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并在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五十一中学等布署了联络点。其实，南下兵团各纵队分别是由北京各大专院校为单位的红卫兵组合而成，其风格和特点也存有差异。例如入住华东政法学院的南下兵团20人为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他们到达当晚即召开座谈会，以周总理接见时的讲话精神宣传“来上海是为了建立革命友谊”。同时，“对各种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出去都准备一下”。而入住同济大学的南下兵团20人，则立即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指责接待站借被子给外地串联学生，说应学习红军长征精神，“革命的把被子退回”，“不革命的统统滚回去”，引起了外地串联学生的不满。当然，各纵队服从总部的指挥和调遣肯定是一致的。

其次，是曾参与“8·31”、“9·4”事件后仍留守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因大部份参与者或者已回京，或者已流散到广州等城市继续串联，其人员已为数不多；又因这批北京红卫兵是自由组合南下的，即便在事件发生的当口，相互之间也没有组织构架的关联，其人员处于自然分散的状态。但是，这一小部份北京红卫兵能够不约而同地“坚持到底”，其观点和行动，其意志和态度都是坚定而果决的。例如原住华纺的北京101中的25名红卫兵，于9月9日暂时离开后又返回上海，他们声称：“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没有关系”、“到上海继续造反”。住宿在上海一医的北京育英中学、第八女中等校的红卫兵曾准备回京，后改变主意，表示“要把上海市委搞掉后，回去向毛主席汇报”，并派出代表回京取寒衣。他们还到处联系借用自行车（要求50辆，已弄到20多辆），不少人骑着自行车外出活动。

最后，是9月11日以后继续自由组合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此时上海正处于接待工作的“上升期”，据统计，9月10日至9月20日，上海每天接待外地串联学生“六、七百批，四、五千人”；9月20日至9月底，上升到“每天八、九百批，五千人左右”，其中北京红卫兵是主要构成。这批北京红卫兵是以串联学生的身份到达上海的，均按照正常的登记程序进入上海的各接待单位。他们一般与南下兵团没有联系，组合是自由的，行动也是自由的。

由此，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这三种组合，因背景和境况的差异，第一种是权威和主导的，第二种是尖锐和张扬的，第三种是松散和自由的（而它们的共同处则在于全来自北京，

多具有红卫兵的身份)。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为应答,一起演变着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主题和故事。

二、关于上海体罚人数的解读

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196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被打和较严重体罚的人数为6665人”,其中6月至8月(三个月)为1037人,9月(一个月)为5616人。

在此,首先应该承认,这组数据不是涵盖的和完整的,比如上海各高校的体罚人数不在此内。事实上,8月4日在华东师大,8月5日在复旦,8月8日在财经学院,8月9日在同济,8月11日在体育学院和外语学院,8月12—13日在上海一医,8月15日在上海科大,8月25日在铁道学院均发生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等体罚事件,尤其体育学院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又如8月13日,天马电影制片厂编导徐昌霖、演员白杨等被游斗,这证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斗行为,在上海文革运动爆发时期就已在各个系统发生了。

但同时应该承认,这组数据毕竟来自于上海最主要的四个系统,其统计数与统计数之间的差异,可确切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境况:那就是1966年6月至8月,上海对“牛鬼蛇神”的武斗尚处在平缓的进行过程中,基本属于各单位的自发行为,其绝对数量也不是很高。而进入1966年9月时(8月下旬已现端绪),上海武斗“牛鬼蛇神”陡然成风——武斗的现场从单位扩展到社会,武斗的手段更增加了残酷的皮带抽打等,遭遇者的数量便直线攀升——请恕直言,这股风潮是从北京刮来的,是来沪串联的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腰扎武装带的北京红卫兵挟带来的。以9月10日为界,8月下旬至9月上旬由首次南下的红卫兵掀起,例如8月27日,北京28中的三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沪闵中学的学生,到梅陇公社朱行大队“把六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三个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一地主婆,另二地主分别受重伤。9月1日,北大的几个学生到杨浦卫生学校,拉住“学校负责人就打耳光,用皮带抽。前后打了两个半小时,二人被打伤”。而9月中、下旬更大规模的武斗,则主要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掀动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6月至9月的体罚情况,请看下表:

上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体罚情况统计表(6月1日至9月30日)

人员分类情况 / 人数 / 比例 / 死亡数 / 比例 / 受伤数 / 比例 / 被剃头数 / 比例

四类分子	/ 1517	/ 22.8	/ 5	/ 45.5	/ 117	/ 24.8	/ 115	/ 26.3
资本家	/ 1041	/ 15.6	/ 1	/ 9.0	/ 23	/ 4.9	/ 86	/ 19.7
教职员	/ 1260	/ 18.9	/ —	/ —	/ 76	/ 16.1	/ 54	/ 12.4
学生	/ 442	/ 6.63	/ —	/ —	/ 44	/ 9.3	/ 15	/ 3.4
干部	/ 179	/ 2.69	/ —	/ —	/ 23	/ 4.9	/ 4	/ 0.9
职工	/ 230	/ 3.45	/ —	/ —	/ 8	/ 1.7	/ 22	/ 5.0
其它	1224	/ 18.4	/ 5	/ 45.5	/ 128	/ 27.1	/ 75	/ 17.2
运动重点对象	/ 772	/ 11.6	/ —	/ —	/ 53	/ 11.2	/ 66	/ 15.1
总人数	/ 6665	/ —	/ 11	/ —	/ 584	/ —	/ 1331	

（资料来源：1966年10月1日，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18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从六月一日以来打人和较严重的体罚情况”（1966年9月30日统计）。所有数据按原始记载登录。

说明：

- 1，“其它”一栏的人员分类情况为“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
- 2，“其它—死亡数”一栏中的“5人”，具体为“旧官吏1人，反革命子女1人，道士1人，职工家属1人，里弄生产组成员1人”。此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
- 3，“受伤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缺少闸北区的数据。
- 4，“被剃头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为杨浦、徐汇、卢湾、南市等四个区的数据。）

由表可知，在整个遭受体罚的人群中，除了运动初期就被各单位定为“重点对象”的，“四类分子”（占受体罚总人数的22.8%，下同）、“资本家”（15.6%）和“社会其它人员”（18.4%）均为重点打击对象，且死亡数、受伤数、被剃头数均为佐证，例如“四类分子”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45.5%；受伤数为24.8%；被剃头数为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

其中的缘由，一是在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早已成为公开的“专政”对象，而“其它”一栏所指的“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则人员情况复杂，有些甚至处于无单位的闲散状态。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分布（明的便于广泛打击；暗的利于深入挖掘），呈现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势，便招引了红卫兵们的勇猛出击。实际上这是文革前就已确立的“阶级路线”的延续，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表现并演化为“暴力—武斗”。二是说明这种“暴力—武斗”随着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串联大军的来到，很快完成了从单位走向社会的过程，在里弄、街道，甚至在马路上随意而全面地展开。这不仅因为“四类分子”、“资本家”等身份是公开的，即时可以捉拿，更在于当时的社会成为了无政府的空间，里弄、街道基本没有能力来行使有效的管辖（即便在武斗现场，会有上海市民自发形成制止武斗的舆论，终究抵挡不住拳脚、皮带的凶狠），红卫兵们自然就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

同时，相比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打击对象，在校教职员和在职工工等遭受体罚的反反而为数较少，即便学校中的主要冲击对象“教职员”，也只占受体罚总人数的18.9%，在职“职工”只有3.45%，且没有殴打致死者（9月30日之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上海，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多在6月至8月）少于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多在8月至9月）。且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因存有师生、同事及其它诸方面的关系，往往会有所克制、收敛乃至被有效制止；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则属陌生人之间的遭遇（尤其对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说），既没有关系，更没有情分，只有阶级对峙和阶级仇恨，往往会因现场气氛和互动的失控导致惨剧——事实上，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制造的几件打人致死事件（包括上海红卫兵在9月份数次打人致死），均归属于“社会的武斗”。另外，此表还显示：受体罚的“干部”人数极少（2.69%），甚至少于受体罚的“学生”（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鼓吹“血统论”，一些学校的所谓“反动”学生和“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受到体罚）。这说明至1966年9月份，上海各单位的干部仍基本掌控着运动，恰如外地串联同学吃惊地说：“我们从东北到福建，都没有看到运动是由党委领导的”。这应该是上海文革运动不同于北京，不同于全国的一个特征。

最后，应该承认，上海遭受体罚的总人数是不高的，因为按同期相比，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85000多人，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于上海160多倍。缘此，正是从那个血腥的战场上转

移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了被称为“资产阶级大本营”、“资本主义大染缸”的上海，怎能不在上海大打出手，把上海搅得天翻地复呢！

三、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现在回到“现场”。

9月13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认“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显然，北京红卫兵的心情和态度是十分激愤的，他们在北京的叱咤和骁勇，骄纵和威风，决定了他们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上海方面对“牛鬼蛇神”们所采取的相对理智和温和的方式。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其中徐汇区四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纪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卢湾区，130多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铁柄阳、长柄锁、火钳、拐拐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打得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送区中心医院，有生命危险）。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临走，“红卫兵拿去五只手表、一百多元现金，两辆自行车”。红卫兵在高邮路某号查抄魏某家时，将魏某“夫妇的脸上涂绿漆”。据统计，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期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15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行动略作调整，“搜家比较少”，主要是开展“串联、调查、宣传和斗争”，且“黄浦区比较集中”。例如南下兵团第十纵队深入黄浦区的里弄街道，踩点21处，其中对12处进行了调查，主要了解上海市民对市委的看法；街道、里弄基本情况（人数、户数、阶级情况）；里弄干部的出身成份、政治情况以及对“黑六类”的批斗等。

北京红卫兵“差不多每到一个街道里弄都必问此问题”，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贯彻阶级路线的情况”。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文斗用于辩论会，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化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再据黄浦区20日的报告，南下兵团红卫兵在黄浦区的活动中武斗了48人（《动态》第705号记为“46人”），其中有教师、学生、社会青年、游民、阿飞等。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9月2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考虑到上海市民的反应，以及总部所处位置的关系，在市体育宫内贴出了《整顿军纪》的布告。其实，这不是总部放弃武斗、制止武斗的表态，而是在局部、在细节严肃纪律的告诫。从13—14日以徐汇区为重点的抄家前哨战，到15日以后以黄浦区为基点的“调查与宣传”，再到20日的《布告》，事实不仅说明南下兵团总部是有整体策划和部署的，更证明各纵队的行动是对总部指令的有效回应。于是，面对上海“不能容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势，总部的意志和决策与各纵队行动之间非但不相抵忤，甚至存在高度的默契和协同，至于当事者进入现场后的狂躁（乱）和暴戾，只是次生的问题而已。况且，除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外，正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还有“9·4”事件后留驻的和不断抵沪的北京红卫兵。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行动报告（9月10日至9月30日，即以南下兵团抵沪为肇始，以南下兵团返京为结束）：

9月12日，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进入市体委看大字报”，在南京路市体委门口散发传单，张贴“强烈抗议”，并发布“最后通牒”。14日后，北体院红卫兵便联络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连续在市体委门口进行广播宣传，并举行颇具规模和声势的揭发批判会。

9月14日，北师大附中、北地院附中一群红卫兵，进入同济大学广播台“和平楼”，声称“‘和平’两字没有战斗气味”，便砸掉外墙上的“和平”两字，贴上“要武”的标语，并搜查了广播台的所有唱片。后来，这批北京红卫兵又爬上该校西南一楼楼顶，扬言“要把屋面上的和平鸽统统砸掉”。当他们用大锤砍掉一只和平鸽时，遭遇了同济师生的抵制，他们在楼顶上叫嚷“革命的上来，不革命的滚蛋”。

9月15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家搜查（陈家66岁，民盟成员、市政协委员），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除一间存封古董文物的房间外，其余可再抄，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月15日深夜，上海侨务处红卫兵在一干部家中张贴大字报，途经此处的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红卫兵便进去搜查，不仅用皮带抽打，还把“一架照相机、四块银元、一套军服和一本日记簿往口袋里装，准备拿走”。侨务处红卫兵见状，向北京红卫兵宣讲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侨务处红卫兵打电话给位于市体育宫内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总部来了六个纠察，说“打坏人活该”，就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

9月15—18日，北京遵义中学十多个红卫兵（住上海蓬莱中学）到沪后三天打了12个人，都是用鞭子打、脚踏、皮带抽，有的“连大便也打出来”。20日下午，他们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里吹”的小学生（指认“流氓”），被路过的工人、居民、学生围住辩论，最后只得“承认错误，才溜回蓬莱中学”。

9月16日下午，北京第二十五中10个红卫兵拿着《重炮猛轰上海市委》等五种传单，吵闹着要解放日报社“大量印刷”。报社总编办负责人说明情况，要求大家“体谅报社的困难”。北京红卫兵立即把门关起来，有的解下皮带，一边抽打桌子，一边大骂“不印就是反革命，就是保皇派”，还恫吓说“不解决就弄到楼下去游街”。北京红卫兵把电话挂起来，责令接待人员“只准讲北方话，不许讲上海话”，前后闹了三个多小时。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因解放日报少印了两份传单，先后三次冲进办公大楼。有的北京红卫兵手执皮带，将接待人员推来推去；有的手拿传单打接待人员的头；有的要把大字报贴在接待人员的脸上；有的骂接待人员“混蛋”、“狗崽子”、“反革命”。

9月16日晚，居住在黄浦区市六女中的北京水利学校红卫兵率天津一中、沈阳十中等串联学生，及该校“海燕战斗队”（低年级为主）一百余人，以一教师“撕掉贴在办公桌上的大字报”为由，将一些教师揪到操场上用棍棒殴打。结果，一教师被打休克；一教师被打伤后，还剪了头发，涂了浆糊，挂了黑牌子。17日上午，市六女中有同事准备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北京红卫兵将该教师关进小屋，用扫帚扫脸，并不给吃饭。当晚，区委干部赶到市六女中，却被拦在门外，北京红卫兵说：“相信同学会自己解决——我们搞好后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

9月16—17日，北京航空学校和北京第十五中20多个红卫兵闯进斜土路第一小学，三次殴打该校干部、教师共9人，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出血、不能动弹，送医院医治。打人时，北京红卫兵派人把守大门，不准外人入内，“附近工人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9月17日，北京五十七中、七中的12位红卫兵，在长宁区民办群联中学武斗31名出身有问题的教师（约占全校73名教师的半数），其中“11人长时间高举双手低头跪在地上，有2个教师还戴上装着砖头的高帽子”，“一位将近临产的女教师也是如此”。每个受罚教师的脖子上都套着一根铅丝，由人牵着，并规定钢丝离地的距离，不符合标准就往下拉。同时，“有三个教师被剃阴阳头，一个女教师被剃成光头；有三个男教师被涂了花脸；有十五个教师受到皮鞭抽打”。下午三时以后，北京红卫兵“栓着一位被剃了光头、赤着脚

的女教师游街，一直游到该女教师的家中”。整个过程中，区委联络员一再进行劝说，北京红卫兵非但不听，还宣称“对出身不好的臭崽子就是要揍”。

9月17日下午，因报社宣布停止承印各种传单，以北大学生为首的一群北京红卫兵冲击解放日报大楼，叫喊“不印传单，是压制革命”。正在楼上休息的夜班工人围在楼梯口观看。一北京红卫兵拍照后扬言这是报社“发动群众斗学生的场面”。后来，有北京红卫兵发现解放日报社附近一小印刷厂正在印制葡萄酒商标，便如获至宝，冲进去强令七部机器全部中断生产，取出这些供出口的装璜用纸，到解放日报楼上大喊：“解放日报印、四旧”，却不印传单”！直至报社人员陪同他们去该印刷厂调查，才弄清真相。

9月17日下午4时，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一〇一中红卫兵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13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体罚和武斗。

9月17日晚，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及上海五十一中红卫兵一百多人，将一“资产阶级分子”带到新康花园，并把新康花园一百户左右的居民全部叫喊出来。红卫兵强迫里弄干部指认哪些是知识分子？哪些是资产阶级？并“命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子女，即使是小孩都要把头低下，不低者就用木棍打”。斗争时，红卫兵将该里弄的前后门全部封锁，不准外人入内。

9月18日，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某中学召开红卫兵大会，宣传“自来红站起来”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并对“黑六类”子弟提出警告。接着，北京红卫兵“斗争了高三（2）班的10个黑六类子弟，要他们一个个交代父亲是否反动？自己是否混蛋？直至都承认才罢休”。19日，北京红卫兵又斗争了高三（3）班的“黑六类”子弟。

9月18日，正在中山医院治疗的一些外地病员，以抄“四旧”为名，要求取消高干病房。因组织人员冲击，受到院方阻拦，便向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求援。20—21日，第七纵队（北大学生）红卫兵两次到中山医院“点火”，院方再三强调医院“不属串联范围”，七纵队仍“纠缠很长一段时间”。

9月18日晚9时许，一群佩带“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索要报纸。他们发现接待站天花板上有贴封条的孔雀和花卉的图案，便叫嚷着“天花板上是四旧，为什么不砸掉”。接待人员解释：这些图案十分牢固，不搭脚手架是敲不掉的，甚至会影晌上层房屋发生危险。北京红卫兵不听解释，“拿起铁管子，跳上台子，爬上楼门”，就撕下封条，动手砸。直至夜12时半才散去。

19日下午，所属南下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等纵队的288个北京红卫兵进入金陵中学，声称“要在金陵中学蹲点，要把这个保皇派的顽固堡垒搞垮”。他们责令党支部交出教职员工名单、职务、工资和出身成份，并和该校少数派结合，“准备先搞党员校长，再搞支部书记”。

9月21日上午8时至夜11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北京红卫兵边打边问“是不是政治扒手？”。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大部份是中学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

卫兵从17日开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个”。他们“随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条”，“有的人身上原来没有手表、照相机、香烟盒的，现在都有了”。22日下午，他们殴打“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晚上又打“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为此，上图群众请来华东师大的三名红卫兵代表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指挥部总部联系。但23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时，师大来了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师大红卫兵提出“辩论、不再打人、释放关押者”等要求。南下兵团红卫兵拒绝辩论，只承认“打人不对”，“说服不再打人”，以至最后“没有具体结果”。

9月22日，首都红卫兵听说松江佘山教堂下有地洞，有藏匿枪枝的嫌疑。一百多名红卫兵便赶往佘山教堂，一边挖地，一边斗争神父马凤祥，结果东西没挖出，神父马凤祥被殴打致死。

9月25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住交大）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9月28日，北京31中、34中和北航的十多名红卫兵尾随被剃光头的外贸学院教师李某，并进入她家（李的公公为沪上大资本家），拿走她身上的“五十元人民币”，骑走自行车，后又有“五、六人住在她家里”。10月5日，这批北京红卫兵准备查抄李家，李申辩财物已由外贸学院红卫兵贴了封条，因而被“打肿了脸”，李的“公公打得不能动弹”。外贸学院红卫兵闻讯后赶到现场，与北京红卫兵发生争执和扭打。晚上，外贸学院“去了三百名左右学生，围住李家，要北京学生出来辩论”，“北京学生把门关起来”。后经多方劝说，包围的学生才散去。

应该承认，以上只是在一般层面上被有关“简报”记录的内容，事实的发生却更广泛，更严重。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

四、现场之二：点上的行动

如果说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在“面”上挑动的武斗，处于一种随机的、散布的状态，即南下兵团、留驻的和新近抵达的北京红卫兵都在参与。那么，发生在“点”上的武斗，则一定是在上海起着“权威和主导”作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制造的。

下面请来自“点”上的行动报告（以南下兵团为例证）。

上音（附中）事件：

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名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

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以低年级为主，高年级外出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这批北京红卫兵还“斗了贺绿汀，往贺脸上吐沫”，并叫贺下跪，脱鞋脱衣，“为了避免武斗，该院红卫兵把贺押走了”。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已安排在化工学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5日中午，这批北京红卫兵要求学校广播台广播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因遭到拒绝而展开激烈辩论。晚6时多，20多名身穿军装、佩戴袖章的北京红卫兵“一边唱、鬼见愁’、革命造反歌’；一边骂、狗崽子’、混蛋’”排队进入学校。这批赶来增援的红卫兵对参加辩论的上音附中的学生“又推、又拉、又打”。7时多，将上音附小校长姜瑞芝（贺绿汀之妻）揪来，一阵“抓头发，踢打，打得她嘴边出血”。接着，他们涌进支部办公室索要广播台钥匙，“有的站在台上，有的站在椅子上”，并责问支书等人的成份。突然，一北京红卫兵吹起哨子，叫喊“大家去砸广播台的门”。占领广播台后，他们“又喊又唱，闹到晚上十一时才停下来”。

16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0人强行住进上音南楼（男二楼、女四楼。主要为北京工学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学生）。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8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到达时，“贺的头被巨布缠绕起来，贺妻姜瑞芝已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爬地、塞嘴”。

19日晚7时，上音附中红卫兵造反派冲进贺家，抽打贺夫妇后，再将贺夫妇拖到附中楼上，伙同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请问：为什么会发明这般的刑罚？如果说抽打是“阶级情感”的泄愤，尚且属于那个时代的通常。此在的“人”，是“敌人”，是“坏人”而已。那么轮换着坐在背上，作弄地体验着“骑”的感觉。此在的“人”，只有“骑”者是“人”；被“骑”者已不是“人”，而是“牛马”样的牲口。因之，这便超越了发泄“阶级情感”的界线，成为了“非人”的行径。迫使被“骑者成为“非人”，被“骑”者无奈，是形式的“非人”；“骑”者迫使“人”成为“非人”，是蓄意为之，有心为之，实为“骑”者站在了“非人”的立场和情感上，“骑”者是实质的“非人”。可见，红卫兵幼嫩的心灵中潜藏着“非人”的兽性，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姜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夫妇一直被打到十一点”。

20日晚，南下兵团十六纵队70多人开进上音附中，贴“鬼见愁”对联，唱“造反歌”，并高喊“红五类站过来，黑七类滚出去，其它人报成份”，这便在校园里引起“要不要报成份”的辩论。不久，又一卡车首都红卫兵（51人）增援到校，冲进广播台大喊大叫“狗崽子们出来辩论。因无人应承，又冲进支部办公室，将支书等三人拖到楼下，“在拖拉的过程中，两派学生扭成一团”，一直闹到凌晨二点。

21日晚7时，第七纵队红卫兵撕毁上音校园里经修改的“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的对联，因上音少数民族班学员和新疆等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出面制止时，遭到北京红卫兵的谩骂，“三人被打”，“当场有四个学生因气愤而昏倒过去”。事情发生后，上音代表提出交出打人者、将打人者开除出红卫兵、派人到医院慰问伤者、昏倒者等。第七纵队则不承认打人，并排起队伍让上音学生辨认，“当时因灯光昏暗，没有认出”。后经协商进入大礼堂举行辩论，会议由各方领队主持，“双方列队进场，并把非红五类子弟赶出会场”（部份非红五类子弟躲在后排旁听）。辩论中，北京红卫兵一再否认打人，上海及少数民族

同学则“纷纷上台揭发”，“并坚持要打人的红卫兵站出来”。为此，双方“言词激烈，气氛紧张”，致使“又有四个少数民族同学昏倒”。此时，一新疆同学指认一北京女红卫兵曾打骂人，该女红卫兵上台后一面勉强表示道歉，一面哭闹着大肆“煽动”。上音红卫兵则坚持“要所有打过人的红卫兵站出来承认错误”。于是“形成了僵持局面”。这时有个北京男红卫兵站起来发言，他大声说：即使我们由于情况不明，打骂了阶级兄弟，那也是“红五类内部的事情”，“今天有人借这个大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个大阴谋，是有人搞阶级报复。一定要揪出政治扒手！”。（这简直是一个爆炸性的发言。它顺应了是当时主流话语，是主流话语的充分表达。它很策略、很技巧地以“阶级阵营”来划分，实质是软化矛盾，缓解冲突；它很坚决、很威严地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指出这是“阴谋”，实质是上纲上线，转移目标。这个发言不仅震惊了全场，更主导了全场）。接着，北京红卫兵打电话向第五、第八纵队求援，并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派出负责人。清晨5时多，上音红卫兵宣布单方面退出会场，第七纵队“纠缠不放”，声称要揪出“政治扒手”。南下兵团宣布组织纠察队着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23日上午，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在上音校园贴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事件》的大字报，再次指认通宵大辩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下午，第十六纵队又开来一辆宣传车，“引起了四、五百个外地学生的不满”，双方展开了辩论。

27日，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奉命回京。下午4时，他们突然在上音校园里贴许多对联，现选取两条：

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八蛋暴跳如雷，反抗党的阶级路线，狂犬吠日没有用。
上海音乐学院的狗崽子温文尔雅，污蔑首都的红卫兵，笑里藏刀真可恶。
横批：雪压冬云何足惧

上海音乐学院的红五类虽然不多，对混蛋们仍应狂镇狠压。
上海音乐学院的革命者尽管糊涂，与王八蛋仍有本质不同。
横批：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音师生立即作出反击，在校园里打起“对联大战”。也选取两条：

指手划脚，包办代替，犹如第二工作组。
打人骂人，蛮不讲理，严重违反十六条。
横批：好好检查

主席书，十六条，总理话——违反几条？
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执行多少？
横批：一清二楚自己知道。

傍晚，上海徐汇区五十四中、市二女中、黎明中学及上音附中的造反派闻讯后汇聚上音校园，对北京红卫兵表示声援，双方对峙的“形势更趋紧张”。为此，上音党委作出紧急部署，要求“大家不再参与辩论，让北京同学回去”。晚7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集体离开，历时两周的上音事件终了。

上外附中事件：

9月15日下午1时，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语学校（上外附中），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该校学生约五百名，红卫兵二百六十名。参与行动的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动武者约五十人左右）。4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有旋凿撬开抽屉，将抽屉板一劈为二，拿走了公章，折走了电话机（装到红卫兵营部）。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便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这批制造事端的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策划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时左右，教师们陆继到校，“即被红卫兵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营广播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强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再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太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铁的大钳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赶走”，还被指认“他们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时许，又一批约20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站在一旁“出主意”。一女教师（因转移黄金到校被红卫兵搜出）“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这时一学生（一北京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滩鲜血，几个红卫兵还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了”（“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是血和血的色泽为祭礼，是以“黑五类”、“牛鬼蛇神”及其后人的血来祭奠、来偿还先人的血。血色终究是恐怖的，它的涌出、它的流淌，关系到一条生命。“逼着将地上的血吃掉”，是害怕呢？还是残忍？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残忍）；另一女教师因不肯剪发（爱惜自己的女性特征，就是爱惜自己包括面子、审美和生命的尊严。剪发，既是政治的宣判，还是人格的辱没。有时候或者在有些人的感知中，人格的辱没，甚至比政治的宣判更刺伤灵魂），结果“被数十名红卫兵推到在地，用脚踏在其身上，硬是把她的头发剪掉了”。

中午11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的人（被批斗者）赤脚，有的还被迫嘴里衔着一只鞋子、一只袜子进行劳动，有的将鞋子挂在脖子上（此处应指“生活作风”、“男女问题”者），个别还挂着大砖块”。当时，教职员工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多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全体党员也是如此”，学校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里，整天在叫：“怎么办？要求市委想办法”。市教卫部有关人员曾三次建议上外党委出面，党委成员一再回避。后党委负责人“于中午去了一次，因准备不足，被这些初二年级同学连问几个问题就讲不下去了”，其它党委成员“也都两手一摊，表示无法可想”。

下午3时半，红卫兵集中对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为什么拍照？拍照为证！既证实牛鬼蛇神的狼狈，更证实红卫兵的威风；既为当下留个影像，更为未来留下纪念。然而，世事流转，真不知这些照片是否还存留于世！）。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6时，被批斗者中有9人押送派出所，其余自己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着脚走在马路上，这些教师“仅是资产阶级出身”，很不满意，一致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首都南下兵团的中学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认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据统计，上外附中的这次行动共斗争了31人（占该校教职工的20%）。家庭出身情况为：地主3人、资产阶级5人、小业主1人，职员2人。政治情况为：中共党员3人，共青团员7人。有关材料认为“仅4人问题较严重”。31人中，有怀孕者、哺乳者、高血压症患者各1人，还有一人准备当天结婚，因参加运动而来校。

17日早晨，被斗教师陆继到校，“问题严重的罚跪，地主家庭出身的半身弯腰，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低头站立”。一女教师罗某未到校，该校红卫兵派人去她家搜寻。下午，这批被批斗的教师再次“穿着涂写墨水字的衣服回家”。当天，市教卫部有两联络员到校。上外党委便召开附中党员大会，要求党员深入学生中去，宣传十六条，并决定采取“做红卫兵营部负责人工作，肯定革命积极性，要求坚持文斗”；“组织学校工人纠察队”；“有重点地做学生家长工作”等措施。

20日，上外附中部份教师在四川北路等处贴出《直至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大字报。上午，十多名北京红卫兵赶到上外附中辩论，强调“大方向没有错”，对做法问题则避而不谈。下午，附中召开初一年级家长座谈会，一些北京红卫兵与上外附中红卫兵闻讯后，包围了会场，责令支书交出讲话稿，要到会家长一一留下地址。因大字报上街，当时上外附中事件在上海产生较大的震动和影响。

沐恩堂事件：

9月14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九纵队（北京体院学生，部署在虹口区）20余人，路经黄浦区西藏中路沐恩堂时，与看守教堂的上海贵州中学的红卫兵接洽，宣传“对牛鬼蛇神就是要打”，“打死人国务院不管”等，接着，便进入教堂，对居住在教堂里的牧师和市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孙某某家的保姆进行罚跪、殴打（该保姆为地主婆，后遭遇剃发后于15日晚自杀）。16日晚，这批北京红卫兵又从马路上抓来9个“游民”，“打了一夜，剃了头发，并把长裤剪短”。

18日上午，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副指挥吴某某的带领下，第十六纵队一百余人（系清华附中、人大、北外学生）开进沐恩堂。这批北京红卫兵首先打电话给黄浦区委，说因扫“四旧”需要一百余件工具，接着，便“在堂内掘地道、敲墙壁”，撬开原上海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复旦大学红卫兵查封的档案室，将市三自爱国会副主席谢某某、秘书长孙某某等6个牧师和4个传道的头发全部剃光，“把白漆涂在这些人的头上、脸上，背部写上、汉奸’、洋奴’字样”，然后关到房内用鞭子抽打。北京红卫兵使用的鞭子有三种：三根电线合成的、五根电线合成的和最厉害的钢丝鞭。“牧师们被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关的五天中，有四天挨打，每天至少二十鞭，多者五十鞭。他们抽打时问牧师疼不疼，牧师答疼，他们就打得狠些，说、看你还敢不敢讲疼’；牧师改口说不疼，他们打得更凶，说不疼再打重些。他们还叫牧师、传道们互相抽打，谁不打就打谁。有的被打得不能走，只好爬行；有的背部、屁股打得发青，出现血斑”（皮带抽打，即使用武装带，以求军容的威严即刻成了威严的武器。如果说那还是缘于穿着军装的便利，那么用电线编织三股、五股的鞭子，则是特别的凶具。尤其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其制作和使用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不是展览，不是恫吓，是打人！于是，一边是拿鞭子的人，一边是徒手的人；“拿鞭子的人”打人，“徒手的人”被打——鞭子不仅成了打人之手的延长，更成了打人之手的武装——对一个徒手的无反抗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疼痛和残忍！中国1967年的两派武斗是暴力对暴力。中国19

66年的武斗是暴力对非暴力！）。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还剪去一家属的半边头发，并“搜去手表、金戒等物品”。

19日晚，和平电影院散场，北京红卫兵以“男女一起走，疑为行为不端”，从观众中捉进20多人（一男子因赶着回家“走得很快，被疑为盯梢”，也被捉来）。经询问，除“感觉不对头，当场打出教堂6、7人外”，其余均被剪裤管、剪头发和抽打，“有4、5人交代态度不好，被关在四楼房间里”。午夜，北京四十一中和上海浦江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在苏州河边捉了7个“阿飞”，经剪发处理后送至沐恩堂抽打（沐恩堂已远近闻名）。

20日，十六纵队红卫兵开着一辆卡车从马路上捉来一批“阿飞”。一20岁左右的女青年“上着白衬衫，下穿一条打破绽的黄卡其裤子”，被指认为“这是个穷阿飞”。花鸟商店一女艺徒因谈恋爱被剪开裤管，撕破上衣，剃掉头发，该艺徒哭丧着说：“我天天要上班，剃掉头发怎么见人”。北京红卫兵回答“剃掉头发更好看”（北京红卫兵热衷于在上海街头上捉拿“阿飞”，并带回据点审讯体罚，从政治上说，是对上海“破四旧”不满；从思想上说，是对上海人的生活作风不屑。都“革命造反”了，都“红海洋”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马路上、岸堤边，怎么还会有携手的男女。在上海人的眼里，这份温存和浪漫本属于个人的正常的生活情调；在北京红卫兵看来，这却是污染社会氛围的丑陋，是属于上海“资产阶级大染缸”的证实，所以深痛恶绝，坚决打击。其实，从心理上说，这又是北京红卫兵既萌发又压抑的性意识的表达。毕竟都已是中学生以上年龄了，性意识的萌发乃至冲动是正常而必然的，但来自于政治的禁锢和思想的暗昧，赋予它极端卑劣、恶浊的意味，于是只有通过反弹性的追逐、打压行动，来舒缓和发泄扭曲的心态）。

当时，北京红卫兵不许任何人进入沐恩堂，“从大门口到他们住的四楼前后设了三道岗哨”，有两个职工进去看看，“被当作坏人打了一顿”，湖南大学一红卫兵听见教堂内传来打人的呼叫声，就冲进去宣传十六条，北京红卫兵要打他，他指着胸前的校徽说：“我是湖南大学的红卫兵，红五类子弟，你们打吧”。结果，这个湖南籍大学生“被扣留了两天”。

据统计，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共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为此，“群众议论纷纷”。住在沐恩堂附近的大庄里治保主任向街道“四清”工作队反映：“我每晚都听到打人的叫唤声、呼救命声。我们要到市委去请愿，到首都红卫兵总部去请愿，这批北京的红卫兵为啥这样打人？”附近的居民群众则不断自发地到沐恩堂门口，与十六纵队的红卫兵辩论。24日晚，共二百多群众围在沐恩堂门口，与十六纵队的红卫兵辩论至清晨，“有的人还到公安局，到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告他们不遵守纪律”。25日下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十六纵队撤出了沐恩堂。临走时，“拿走了18只手表，2千多元现金，沐恩堂房屋建筑结构蓝图和其它重要资料等”。

上音（附中）事件、上外附中事件、沐恩堂事件，两件发生在学校，一件发生在教堂，均是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通过踩点，而重点进入、全力投入的，其中上音（附中）事件从起始到末后历经两周（9月13日—27日），牵涉到第七、第十六等数支纵队，基本反映了南下兵团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

至于南下兵团的行动为什么会落实在这三个“点”上？确实，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中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第十六纵队中有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到沪后自然会去上海的同类学校串联。沐恩堂则地处人民广场东侧，与南下兵团总部市体育宫隔街相望。如果说在上海成千所学校和几十座教堂中，因专业相同、距离相近而导致北京红卫兵的抵达，最终演变成南下兵团施展身手的地方，是属一种偶然的情况。那么，在北京红卫兵的视域中，艺术类的上音（附中）的红五类只占30%， “阶级阵线”模糊而混淆；外语类的上外附中一潭

死水，“牛鬼蛇神”相安无事；宗教场所沐恩堂经上海红卫兵搜查后已趋于平静——这就是上海“资产阶级右派”的境况，这就是上海文革形势的缩影，这怎能不提振起来自“革命中心”的北京红卫兵的巨大愤慨呢！这怎能不應該在上海掀动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呢！正是从这个逻辑上推演，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音（附中）等三个点上的行动，又属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此，偶然的因素是随机性的；必然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况且，就实际情状而言，南下兵团不可能在复旦、交大等著名大学中制造动静，有所作为；也不可能持续地在一般的中、小学校中投入重兵（1966年9月，与工人造反派的结合尚未提上日程，那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的任务），由之，将上音（附中）等三个单位列为重点炮轰的“封资修的堡垒”，恰是适宜而典型的。

注释（略）

□ 原载《史林》2008年第三号

~~~~~

### 【史海钩沉】

#### 府学胡同故事：神秘的大院

• 黄秀纯 •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一处豪华的四合院，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这个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宅，道光、咸丰年间，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易名“增旧园”。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1966年以前归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1967年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

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坐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

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依据荣大为《北京文物



事业发展梗概》，见《北京文博》）。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 1 件，付款 7 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 1 件，付款 1 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 1 件，付款 1 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 1 锭，付款 2 分。  
象牙杆狼毫笔 1 支，付款 1 分。  
全套二十四史 7 1 1 册一套，付款 1 0 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 1 本，付款 8 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 5 元、《金瓶梅》等 1 2 0 8 0 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 5 0 0 方。

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

由于“首长”经常“光顾”文物管理处，保卫“首长”安全是件头疼的大事。军宣队负责人常凯多次向有关部门请示，在院子围墙上架电网、进驻部队警卫，确保首长安全。上级领导部门迟迟没有批准。在居民区院内怎么能拉电网呢？事也凑巧，1970年夏，晚饭后“天天读”时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内“一帮一，一对红”谈心。其中不知道谁一抬头，看见房上似乎有个人影“嗖”地一晃没有了。这还了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是羽毛球院，紧邻“首长接待室”。二位立即到办公室向军宣队报告：“发现房上有人。”军宣队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拉响了战备铃。铃声就是命令，大家纷纷从办公室跑出来集合。只见常凯同志从前院跑步到后院和大家说：“同志们，有情况！根据李新乾、袁增信的反映，他们二人发现羽毛球院房上有人，今天谁也不准回家，各队给我搜，大家分散活动，各自为政，抓不着阶级敌人决不收兵！”

府学胡同36号院子大，前后院好几层。只见大家有搬梯子上房的，有在院里犄角旮旯搜索的，折腾到凌晨一点多，什么也没找到，连个人影也没看见。这时候常凯把李新乾、袁增信找来，问：“老李，你们俩到底看见啥了？”李新乾吓得也不敢肯定了。说：“可能……可能是猫吧。”这时候常凯也火了，说：“你们那么大的的人了，连个猫和人都分不清，白活了！”这时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宣布解散呢。常凯转过脸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第一次战斗结束，但我们不能说是胜利，因为没有逮到人。这样吧，我看道远的和女同志先回去吧。道近的全留下，继续警戒，决不放走一个坏人。”于是有我和郭仁、李伟、张宁、刘精义、喻震等几个住在地安门东大街113号的男同志全部留下继续巡逻。

为了吸取教训，军宣队再次申请安装电网和派武装警卫。不久，经审批，有关部门派来某部队一个班的警卫，白天持枪站岗，夜里巡逻。36号院子四周也架起了高高的电网。公安部门有规定，在市民住宅区内不许拉电网，而府学胡同36号院情况特殊，经批准拉“假电网”（铁丝网是真的，只是拉一根电线挂上几个红灯炮儿），到了夜里电网上红灯一亮，可谓壁垒森严。从此，更增加了36号院的神秘感。

警卫持枪站岗，可苦了广大职工。只要“首长”一来，大门紧闭，然后在院里戒严。所有职工只准进不准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动。尤其是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首长”来了，谁也不能回家吃饭。等着“首长”走了方可解除禁令。

一般的“首长”来都好接待，只有江青来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恒温21度，夏季好办可以安空调，冬天就难办了。当时“文管处”没有暖气，各办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炉子。而接待室不能生炉子，怎么办？于是经协商从隔壁的妇产医院锅炉房挖管道，把暖气管接到“首长接待室”，而烧锅炉我们另派自己人——刘景春负责。由于接待室离锅炉房远，要把室内温度控制在恒温21度谈何容易。特别是江青来了，室内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锅炉怎么烧？如何通知刘景春？最后经研究用“声控”办法。在接待室和锅炉房之间安一电铃，以铃声为号：“二长一短”温度高了，“二短一长”温度低了。这边听着铃声烧锅炉，温度低了好办，多加两铲子煤，把火烧旺，温度自然上去了。温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内温度在25度～27度之间，江青来了。这时候接待室同志使劲按降温的铃声。只见刘景春这边忙得满头大汗，从锅炉里往外扒煤，封火，可让温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难也。

原来文物管理处的大门口有一个小缓坡，“首长”的汽车大而底盘低，汽车拖底时有发生。一天叶群来文管处，出门的时候汽车底盘拖底卡在缓坡上，出不去也进不来。这时候看传达室的刘清源招呼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大家喊着号子连抬带推，楞把汽车给推出去了。大家就这么使劲抬车，叶群心安理得地坐在里面也不下车。于是大家自嘲地说：“过去见过抬轿子的，没见过抬汽车的，今天长见识了，让哥儿几个尝尝抬汽车的滋味。”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由军宣队出面联系市政工程部门。由于“文管处”部门特殊，很快市政施工人员前来，将大门口的缓坡降为平地，并铺上了沥青。

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四人帮”一伙人提供方便，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四人帮”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

江青曾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为“闲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从这些闲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预料自己所作所为的反党罪行早晚会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临。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康生虽然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事实是如此吗？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以大公无私为名，行贪得无厌之实。他们用毕“归公”了吗？没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据为己有了。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我在府学胡同这个大院里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十年基本在这里度过，经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帮”对文物的贪欲，大肆掠夺党和人民财物，用仁瓜俩枣的钱将贵重的私人物品占为己有。1979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从府学胡同36号院迁往北海北门，在这里我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从一个普通文博工作者迈入了考古事业。

2004年4月22日于大房山金陵，2017年4月22日修订于古燕斋

~~~~~

【不堪回首】

天啊，见到父亲那牛鬼蛇神的样子！

• 赵 旭 •

我的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分子。

据妈妈说，反右运动时幼儿园里很多小朋友整天对着我喊，“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旭旭的爸爸是右派。”于是，我就挥舞着小拳头大声对着喊：“我爸爸不是右派，我爸爸不是右派。”

到了上小学时，我的梦中时常会出现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天空如大海，清澈透明，映出自由飞翔的银色海鸥，和引吭高歌的金色黄鹂，一首悠扬的曲儿唱出满天的星斗，柔美如鲜花怒放，铿锵似钟鼓齐鸣。

一次写作文时，我不经意流露出我想长大后驾着飞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然而，由于父亲是右派分子，学校少先队辅导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异想天开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如何真正的脱胎换骨，怎样与你父亲彻底划清界限。”此话像一瓢冰凉刺骨的冷水劈头盖脸泼洒在了我的头上，让我稚嫩的身体在寒风中打了个激灵。

那年“六一”儿童节上，我果然就成了班上少数几个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之一。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它给我幼小的心灵早早地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让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人生的坎坷，使我早早地体验到了封建王朝株连九族政策的严酷。那时候，很多同学故意在我跟前冒着怪声唱：“右派，右派，是个老妖怪……”此时的我已没有了辩解，也没了抗争，可我的心在颤抖，“右派”两个字像一把尖刀深深扎在我的心里，让我流泪，使心滴血。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灰蒙蒙的天空像扯裂了底的破筛子淅淅沥沥地连续下了几天小雨。一天中午，姐姐踉踉跄跄披散着被雨打湿的头发从学校跑了回来，一进门她冲进里屋扑

在被子上放声大哭了起来。妈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被姐姐反扣的门外哭喊着，可姐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止了哭声，哽咽着将门打了开来。

原来，这天姐姐到学校去后，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他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的墙角，狗崽子们低着头，红五类们则一边跺着脚，一边大声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一边唱，一边将墨水朝狗崽子们身上泼去。唱完歌，红五类们让满身满脸流着黑红墨水的黑五类同学表态与家庭一刀两断。

可姐姐生性倔强，瞪着眼始终不说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这下可不得了，激怒了的红五类像一群发了疯的狮子扑上来揪着她的头发又打又骂，发泄了一阵怒气后将她连踢带搯轰出教室门外。妈妈一边默默地听着姐姐的诉说，一边将姐姐的湿衣服扒下来，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套在姐姐的身上，妈妈的两条胳膊紧紧地将浑身哆嗦的姐姐搂在怀里，她的脸贴在姐姐发青的面颊上，泪水如泉涌般狂泻在姐姐的脸上。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了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很多农村由于没有了地富分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

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解放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因为他父母解放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的头上顶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地主分子的牌子，弯着腰让那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进行谩骂批判，而当时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对他进行斗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时的一个同桌同学，并且，这个同学在旧社会能上学又是得到了那个死了的老地主慷慨资助。这个地主儿子一直打着光棍，40岁刚过的人那时腰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每天低着头在队里干最脏最累的活，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是一个下等的人了。招工的来后一问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单位敢接受我。公社每年征兵，我更是望而生畏不敢有丝毫奢求，只能和农民一起默默地劳动，凭自己的毅力在煤油灯下发愤学习。

林彪事件后，国内形势暂时缓和，好不容易公社推荐我报考了大学，虽然成绩是全自治州第二名，我还是被刷了下来。

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面目清秀，学习是公社中学高中班的尖子，又写着一笔好字，他就根本没有考试的资格，可这个富农儿子被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当时的人们感到这个姑娘真傻，不可思议。学校的老师就轮番给那个女同学做工作，女同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复转军人，富农儿子于是就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老老实实去生产队劳动。有一次我在路上见了她，他穿着一件破烂的黑棉袄，腰上扎着条草绳，见了她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时间生活已将他完全改造成了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有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造反派们却制造假象说其畏罪自杀，并在其停尸处举办现场批斗会，贴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幅标语。当时这个“走资派”的家人是不敢哭的，可那天一件怪事突然发生了。就在人们批判口号不绝于耳时，这个“走资派”的儿子突然走过去狠狠踢了几脚僵硬的尸体，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与其父亲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我后来得知，这个走资派当年也被阶级斗争的蛊惑曾经扑向所谓的右派反动派撕咬过，他的手里有多个冤屈的右派家破人亡，他万万没有想到今

日里又被同样党化教育的儿子踢了自己的尸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个时候在这种违反人伦道德的教育下，不知有多少人由于亲人的背离而彻底绝望死于非命。

许多年后，我做了记者，了解到这么一件事。兰州有个女士，1958年她两岁时，其父被押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冻饿加上强体力劳动使其父被折磨死在了戈壁荒漠。她母亲在她父亲劳教后与其父离了婚改了嫁。她多次给我打电话问我采访夹边沟幸存者时知不知道她生父的情况，好给父亲烧个纸点个香。尤其清明节家家户户祭扫先人墓地时她的这种思念更为强烈。我在电话里听到这声泪俱下的声音，心里撕裂般疼痛，只能陪她悄悄地掉几滴眼泪。她说她的继父是个工人，可由于血缘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她脱不了与生父的干系。到了中年的她，多么想知道她生父的情况。可那个年代，甘肃河西走廊几十个农场折磨而死的右派太多太多了。死了的人当局又严加保密，无处查起。我没有办法满足她的要求，告诉她的父亲到底埋在哪里，死在何方。我只能仰望苍天，面对戈壁，祈祷当年的游魂野鬼给他们的家人托个梦，不要让他们梦牵魂绕日日思念。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遗忘的，就像我们不能忘记纳粹的血腥、日军的铁蹄、斯大林的暗杀、反右的“阳谋”、文革的浩劫、波尔布特的屠城等等，尤其今日又有人重提再搞阶级斗争。这不能不让我再一次想起当年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我的眼前不时晃动着弯腰勾背戴着大牌子的牛鬼蛇神。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好奇地跟着同学们也出了校门来到大街上，我想知道这些牛鬼蛇神到底长着怎样的牛头马面。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我敬爱的爸爸吗？

几十年了，这双眼睛还是那么坚毅，那么倔强，那么善良，那么宽容，它透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它闪耀着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永远的渴望，它让我看清了极权政府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屈辱和愤懑，让我看到了罪恶的反人类行为给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造成的血泪和苦难。过去的那些日子里，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冤假错案、是非颠倒的事情擢发难数，真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我知道，天空本是蔚蓝色的，既得利益者的巴掌只能捂住自己的眼睛而遮不住天上的太阳，谦卑、平和、博大、反省将会辉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 来源：《静可阅》微信号

~~~~~

【各抒己见】

谈谈“文革”

• 严 锋 •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话题，但是我也一直很犹豫，不确定现在谈这个的时机是否合适。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家包括我本人（虽然当时还很小）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家破人亡。我是“文革”一生黑。当然我对这种对“文革”的仇恨和恐惧不仅来自于亲身的经历，也来自于我对“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总体性的思考。

但是，撇开一切否定性的情感和认知，“文革”当然有它积极的、诱人的、甚至可以说永恒的一面。我很少谈论这一面，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对“文革”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算的时候，来谈“文革”的好处，时机不合适。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时机”“策略”“善意”这样的词都不如真相更有意义，而真相就必须是全部的真相，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客观就是最大的善意。

所以，就是最仇恨“文革”的人，对“文革”的积极方面也不必讳莫如深，一切都应当摊到桌面上谈。首先，我想澄清两种对“文革”积极意义的最流行的看法。一种认为“文革”是有效的反腐手段，一种认为“文革”打破了阶层固化。这两种说法都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伤痛和软肋，非常有诱惑力。但我想说，这都是不能成立的。

先说反腐。用“文革”来反腐，就像指望农民起义能建立地上天国。最近很热的一个新闻，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张献忠的腐败不比崇祯小，暴力更胜之。“文革”分几个时期，在前期高潮阶段是无政府无法治的暴力。当时最流行的抄家，只要是地富反坏右，造反派都可以上门掘地三尺，这是暴力掠夺，比今天的贪腐和拆迁可是厉害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

“文革”后，这些抄家的财产和物资部份物归原主，但大多不知所终。我奶奶家被抄走的东西，一根毛也没有还回来。到哪去了？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腐败源于不受限制的权力，“文革”初期的暴力就是最不受限制的特权，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是最恶性的腐败。“文革”后期暴力退潮，但以“走后门”为代表的在招工、分房、上大学方面的腐败远超“文革”前。“文革”是权力肆虐的年代，上到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文革”小组，下到无法无天的底层造反派组织，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享受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狂欢。他们摧毁权力是为了建立自己更大的权力。

“文革”的腐败与现在的腐败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今天的腐败令人愤怒，但那时的腐败令人恐惧，因为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今天的法制和舆论监督还很不完善，但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文革”时的腐败对人伤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文革”的腐败是在砸烂公检法和没有任何媒体申述渠道的背景下产生。因为物质的极度匮乏，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腐败，在那时就决定人的命运，乃至生死。你不认识菜场卖肉的师傅？对不起，你别想从他手上买到好肉。你不给厂里头头拼命送礼，就别想分到房子，尽管那只是一间煤卫都没有的简易房。许多女知青为了回城，不得不以身体为代价，这不是腐败？

连江青在74年的一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都说：“现在走后门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参军，没有门路根本进不了学校和部队，不给当官的送礼，不走歪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老师、老将，光他们写的条子就够一个营、一个团，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完全变成了后门兵、后门大学。这样下去，工农群众能答应吗？”

再说阶层流动。当时从工人农民中火箭式地提拔了一些国家领导人，有的甚至当上了副主席和副总理，这看上去很像打破阶层固化的样子。问题在于，这并非正常健康的阶层流动，这些人有的是因为造反的能力，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劳动模范，然后被钦定提拔。他们并不具备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能力，甚至闹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这样的笑话。

从1966到1971年，绝大多数高校都停办或停止招生，在这种情况下，阶层怎么正常流动？拿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江苏省苏州市辛庄公社金星大队槽浜生产队来说，当时全村约100人，从1966到1978年，没有一个人上大学，也没有一个人成为大队一级的干部，只有一个人参军，到部队里做了炊事员，这是整个村最大的光荣，唯一的阶层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村的小伙伴有不少上了大学，有的做到中石油中层，有的做了老板，有的在外打工，不少人都有了车，在苏州上海买了房。这种流动，比“文革”时高一万倍。

下面说说“文革”的积极意义。

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积极意义，就是让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因循守旧的传统性格，变得敢想敢干，无所不为，天不怕地不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心理基础。

“文革”让中国人知道，什么官啊，等级啊，秩序啊，制度啊，传统啊，口号啊，祖先啊，神圣啊，全是狗屁。国家主席都能批斗，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代代如潮涌，小车不到只管推，只要不被抓起来，什么都可以干。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你会说这也不好啊，这不是更可怕吗？这不是把人心中的恶魔放出来吗？无法无天，礼崩乐坏啊。是的，在哲学上，这叫解构，就是认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先天的，内在的，绝对的，永恒的，一切都是人为的建构，当然也就可以改变重建。没错，今天的很多负面的问题当然与“文革”的解构有关，但今天惊人的发展，也同“文革”有关。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禁止亦要为。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我认为，他说的前一句在哲学上是成立的，不破不立。问题出在后一句，他太强调破，轻视了立。但确实没有破，也就没有立。

我前面说“文革”并没有真正打破阶层固化，没有流动起来，人还是束缚在土地和单位。但是“文革”确实激发了人对流动的渴望，建立了流动的心理基础。一旦流动的束缚被打破，就喷薄而出，汹涌澎湃，气势惊人。

我还记得从80年代到今天的出国潮，当年有一个说法，叫世界大串联。请注意，串联这个词是红卫兵发明的。当然红卫兵的串联很快就被压制了，但那颗串联的心，却从此跳荡不息，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世界。

所以“文革”的反传统，反特权，反体制，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破除迷信，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解构在目前获得了一种新的世界性的意义，那就是：川普。

真的，川普搞的就是一场美国式的21世纪的“文革”，只不过规模和性质与我们当年那一场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文革”在西方一点也不新鲜，早在我们“文革”的同时，他们

也有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学生运动，日本的全共斗，克林顿、菅直人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体制都会随时间的推移出现僵化，都需要重新启动和激活。世界永远需要激情的释放，民众的狂欢，无政府的渴望，建制的撬动，草根的自主，暴力的崇拜，对官僚体制的破坏与震慑。从毛到川普，这里面有一条似断实连的线索。

问题是：法律的位置在哪里？监督的机制成熟吗？舆论的传播畅达吗？人民的素质足够吗？这些问题中，只要有一个答不上来，那么任何“文革”都只可能是真正的噩梦与浩劫。

□ 摘自《自由微信》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